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明代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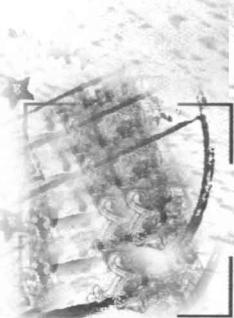
陆耀东 主编  
陈文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明代诗学

陆耀东 主编  
陈文新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诗学/陈文新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11

(中国诗学丛书/陆耀东主编)

ISBN 7-5438-2403-5

I . 明... II . 陈... III .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018 号

责任编辑: 曹有鹏 许久文

张志红 吴文娟

封面篆刻: 弘 征

装帧设计: 陈 新

## 明代诗学

陈文新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51,000

ISBN 7-5438-2403-5

I·309 定价: 18.50 元



## 总序

这套《中国诗学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诗学概念,系取狭义。不过,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先秦乃至魏晋,往往是将诗与文(而且是广义的“文”,含历史、哲学、文学等)混合在一起谈论,故我们在解读古代诗学时,又不能不逾越狭义诗学的范畴。《丛书》的内容,涵盖中国古代诗词的理论、批评、鉴赏和20世纪的新诗诗学。它共分九卷,基本以朝代为序分卷,兼顾中国诗学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先秦两汉广义的诗学为第一卷;魏晋南北朝诗学,为第二卷;唐代诗学,为第三卷;宋代诗学,列为第四卷;明代诗学,为第五卷;清代诗学,为第六卷,但将晚清(以1840年为标志)划出与民国初年诗学(以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合为近代诗学,为第七卷;从五四前夕至40年代末,为现代诗学,列为第八卷;50年代初到90年代为当代诗学,列为第九卷。这种划分,我们虽然可以申述各种理由,但毋庸讳言,它也和其他分期方式一样,<sup>①</sup>存在诸多困难与局限。

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如何估计和评价,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说:它零星的感悟多,鉴赏性的随感多,即使精

<sup>①</sup> 如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以诗学的发展线索为分期根据。

彩,也不过是吉光片羽,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云:它比西方的诗学更精彩,表面上看,它大多没有表述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在颗颗珍珠般的见解后面,有其内在联系和体系在。但不管是前者抑或后者,谁都不否认,中国诗学是一个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世界,是一个闪耀着无尽光辉的星海。是的,它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数以万计诗论家和诗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心血。有些诗学问题,从最初不免于粗泛的涉及或提出,到后来论述趋于周密精深,历经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之久。其间有冷静的学理探讨,有持不同观点的杂含意气的攻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深度的层层递进,也有前进途中的迂回曲折;有的是诗学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有的是理论转型期的过渡性成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教“温柔敦厚”和“思无邪”观念,显然意在以其规范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但其影响历时两千多年而不绝,值得深究。《文心雕龙》如书名所示,并非诗学专论,但含诗学在内,其精妙与文采,亘古未有,即使置于当时的各界诗学中,它也是罕见的经典性论著。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出,“诗话”、“词话”大量出现,其中如《白石诗说》、《沧浪诗话》、《渔洋诗话》、《随园诗话》、《人间词话》等,虽并非均系原创性诗学,但都有各具特色的诗学理论做支撑,有的形体就具有系统性,有的则须由研究者加以梳理。以《沧浪诗话》为例,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诗辨”近似总论;“诗体”着重于论诗的体式;“诗法”总结诗的若干技巧问题;“诗评”主要为对诗人诗作的评论兼及批评方法及标准;“考证”有关于诗人事迹的追寻,有对作者、版本和诗篇、诗句的索隐和考证。对诗歌艺术的论述,相当系统。《沧浪诗话》有一段名言: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

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sup>①</sup>

这是《沧浪诗话》的理论核心。严羽的诗论，虽不免有以禅喻诗的痕迹，然而由于他对诗的内在特性有深刻理解，因而精辟之见多多。

如所周知，中国诗学在先秦阶段尚处在胎萌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诗学，开始形成不同理论架构的雏形。魏晋、唐宋、明清是中国诗学的三个高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学的形成期，情思和格律的构建吸取了西域文化的异质影响，诗学从文、史、哲中走向独立，诗的格律理论趋向成熟。这一切，为唐诗高峰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准备了条件。唐宋不仅是我国诗词群山里顶峰中的顶峰，诗学也有很大发展，几乎论及中国诗学的所有问题，如“用事”、“自然”、“妙悟”、“神思”、“意境”、“形神”、“寄托”、情与景、诗与理、含蓄与直露、诗味、诗法、炼意、诗眼、比兴、声韵、风格、诗体等等诗学内部问题，无不涉及。意境说在王昌龄的《诗格》<sup>②</sup>中正式提出后，影响深远。20世纪初美英流行的意象派诗的产生，即受唐诗流泽，不少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是诗人受中国古诗启迪而创作的。<sup>③</sup>关于诗与理、诗与禅的关系的理论探讨，在宋代臻于极致。明清两代诗学论著繁富，其中不乏创见和新意，但大多系整合式成果。晚清民初，中国诗学从古典型向现代型过渡，外国诗学开始影响中国诗学，王国维是一代表。<sup>④</sup>20世纪新诗诞生后，一些诗家致力于建构中国新诗理论体系，胡适、闻一多、戴望舒、梁宗岱、朱自清、朱光潜、艾青、胡风、何其芳、袁可嘉等均做了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未能

## 总序

<sup>①</sup> 《沧浪诗话·诗辨五》。

<sup>②</sup> 《诗格》，王昌龄作，有人认为系后人所撰，姑存疑。有关“意境”一段原文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sup>③</sup> 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sup>④</sup> 参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完成中国诗学的转型和重构。这，惟有待于 21 世纪了。应该说明：20 世纪中国学者对传统诗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史料的校勘、辑录、出版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在论著方面，从王国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以世界现代诗学观念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左”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和简单化，严重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进展。

《丛书》的主要依据为中国诗学理论批评文字，时或注意从诗词创作中总结出诗学理论，或联系诗词创作中的典型现象，或注意当时流行的欣赏习惯和鉴赏标准。在当时高层次诗人、学者所持的观念与一般读者中流行的审美观念之间，我们或重前者，或取兼顾。

《丛书》的总体设计工作由我承担。我的设想是：不着意于将它写成中国诗学史，尽管每一个卷也有对特定时段内诗学发展概况的勾勒，全景的鸟瞰，上承和下传，但限定所占篇幅不得超过该卷的四分之一；同时要求各位著作者致力于此时段内主要诗学理论问题的深入细致的探讨，阐明其对中国诗学的新贡献，尽可能地顾及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中国诗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求每一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获。

《丛书》企图贯彻“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比较准确地阐明各个时段的主要诗学理论和审美情趣，并用现代诗学观对它进行再审视。参加本丛书撰写的有 12 人，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无法求得完全一致。为了不致于在大的原则上自相矛盾，我要求同仁在著述中贯彻下列观点：1. 诗必须首先是诗，诗学必须首先是诗之学，不能用任何别的“学”取代它、削弱它；2. 诗固然要表现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再现，日常生活中的情与诗情，一般的“意”与诗意，一般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等等，都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其分界线在“诗化”，前者未经“诗化”，严格说来，还在诗的宫墙之外；3. 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二者的创新与发展；4. 作为诗学，不能不触及内容与形

式的关系问题，我不主张机械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二者在具体作品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表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果在理论上对二者有偏至，都会产生消极后果，故不主张硬性地分为第一、第二，而持并重论；5. 每个时间段的诗学都往往有多家多派，我不主张以某家某派为圭臬，去要求各家各派，而期望俯视各家各派，既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因为各个流派互有短长优劣，少有一无可取者，也无十全十美者；6. 鉴于曾有忽视诗艺的偏向，我力主向这一方面倾斜……凡此种种，有的作者坚持自己的见解，我也不作强求，因为可能这种“坚持”，恰恰是书中的精粹所在。有的著作者放弃了或修正了原来的己见，迁就我持的观念，如果我这些看法有误和因我的失误而导致损害了专著的质量，则是我的过失和罪责。

总序

所有参与《丛书》撰稿者主观上都追求著作史料准确可靠、充实，论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诗学核心理论问题分析细致深入，有理论高度和深度，著作在整体上有较高学术水平，每一卷至少有若干章有著者的独到之见。凡借用已有成果处，一定加注说明，以免掠美。撰稿者和我虽竭尽全力，但因学识所限，加之时间紧迫，故每一本书，并非处处精彩，一是留下了明显的遗憾，如《宋代诗学》对词学理论未作专门论析，即是一例；二是个别处所难免存在谬误，恳请读者和方家指正。至于学术观点的歧异，我想，今天的学者当会视为正常现象。

本丛书的每一部书稿，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为了避免个人偏见和疏忽，还请几位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分别审读部分书稿，《先秦两汉诗学》是尚永亮教授，《魏晋南北朝诗学》是王启兴教授，《唐代诗学》是李中华教授，《宋代诗学》、《清代诗学》、《近代诗学》是陈文新教授，《明代诗学》是郑传寅教授。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劳绩。

这套丛书的出版，应该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熊治祁社长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他们出于对学术事业的热忱和远见，对这一课题特

别重视，他们是《丛书》的催生人，对《丛书》的出版始终给予全力支持；应该感谢为《丛书》撰稿付出辛勤劳动的作者，和协助我工作的同志们；感谢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负责同志，他们给了不少助力。我深深体会到：每本书虽是著者的成果，但也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劳动结晶。

陆耀东

2000年11月15日



## 中国诗学丛书

- |         |         |
|---------|---------|
| 先秦两汉诗学  | 孙家富     |
| 魏晋南北朝诗学 | 陈顺智     |
| 唐代诗学    | 乔惟德 尚永亮 |
| 宋代诗学    | 张思齐     |
| 明代诗学    | 陈文新     |
| 清代诗学    | 李世英 陈水云 |
| 近代诗学    | 程亚林     |
| 现代诗学    | 龙泉明 邹建军 |
| 当代诗学    | 於可训     |

目  
录

总序 .....	陆耀东 (1)
绪论 .....	(1)
一、汉族文化的复兴与明代诗学的古典主义思潮 ...	(3)
明朝开国的文化意义——盛唐气象和西汉气象	
——“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唐宋派与前	
七子的分歧所在	
二、明代诗学的古典诗歌创作背景 .....	(14)
《风》诗传统与《雅》《颂》传统——唐宋诗	
之异——明人的尊唐抑宋——宋诗的解说性、演	
绎性特征	
三、明代诗人的大家情结 .....	(23)
何为大家材具——“古惟独造，我则兼工”——	
膨胀的自尊心态及诗坛纷争	
<b>第一章 诗“貴情思而輕事實” .....</b>	<b>(38)</b>
一、“诗史”之说的辨证 .....	(40)
“诗史”概念的出现及其内涵——“诗史”辨	
证的三个层面——诗人不能仅仅陈述生活——	
“事”在诗中的作用	
二、诗、乐关系的梳理 .....	(55)
诗、乐的共生性——明代主流派诗学对音乐性	
的重视——李东阳论“调”——谢榛论声律——	
音乐性与抒情性	
三、“真诗在民间”的内在蕴含 .....	(71)
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李开先：“真诗	
只在民间”——袁中道等：“真诗果在民间”	
——冯梦龙视民歌时调为“私情谱”	
<b>第二章 诗体之辨：从体裁到风格 .....</b>	<b>(88)</b>
一、体裁辨析 .....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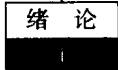
11/28/11

诗、文的功能之异——诗、文的表达方式之异 ——诗、文的语言之异——古诗与律诗之异—— 律诗与绝句之异	
二、风格辨析 .....(120)	
风格论溯源——时代风格——作家风格——个性 与风格的多重关系——个性与规则的对立统一	
<b>第三章 信心与信古 .....(142)</b>	
一、前后七子诗学的核心及其体系 .....(143)	
七子派对体裁规范的重视——以体裁规范为支柱的诗学体系	
二、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148)	
入门须正——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本色”的提倡	
三、歧路亡羊：主流派的内部争执 .....(155)	
高棅、李东阳倡导领会神情——李梦阳主张依傍规则——何景明、王廷相注重诗人的风格差异 ——王世贞试图弥合李、何分歧——谢榛、王世懋持论有别——胡应麟偏袒李梦阳	
四、对“变”的观照：两种价值尺度 .....(165)	
信古派和信心派的划分标准——信古派：“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信心派：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不可以时代定优劣	
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176)	
公安派的理论性质：作品高下取决于“内容” ——“性灵”一词的种种内涵——公安派的“性灵”偏于私生活情趣——“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哲学渊源与诗学渊源——公安派与《诗》、《骚》传统	
六、信心论与信古论的融合 .....(189)	
两种“深刻的片面”——屠隆、李维桢、邹迪	

光、袁中道等人的折中态度——竟陵派的理论建构	
<b>第四章 “清物”论的生成及其在明代的展开</b> ..... (204)	
一、标志隐逸品格的“清”	(204)
“清”与《世说新语》——“清”与谢灵运山水诗——山水美的发现与隐逸倾向	
二、作为审美范畴的“清”	(208)
“清刚”之“清”——“清逸”之“清”——司空图所倾心的自然景色——“清逸”和隐逸，一种超世拔俗的美	
三、胡应麟论“清”	(214)
李、杜大家地位的确立——明代主流派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胡应麟笔下的“清”兼雄浑和清逸——“格清”与“才清”之别	
四、“诗，清物也”	(223)
“诗，清物也”的提出——“清”对俚俗的排斥——竟陵派之“清”不容纳雄浑奔放的风格——钟惺设计的两组诗学概念	
五、竟陵诗境	(239)
“清”：自然景物的描写；人的神情、胸襟的描写；其他——“幽”：以迷茫朦胧为意境特征；也有较为爽朗开阔的，或界于爽朗开阔与迷茫朦胧之间——“孤”：人品、情操的“特立”；景物的孤峭幽深，是内在精神世界的象征——竟陵派效法的对象乃王、孟诗派的支流	
<b>第五章 从格调到神韵</b> ..... (258)	
“本色”论是格调说的依据——明代格调说演变的三个阶段：自高棅至李东阳；前七子领诗坛	

风骚的时期；后七子领诗坛风骚的时期	
一、格调说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明代的演变历程	……(259)
格调说与神韵说均属于审美诗学——明代的主流诗学反对“诗以意为上”——艺术比意图更为关键——意象应在诗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命意是否重要	……(267)
谢榛、王世贞等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触物起兴，不涉理路——“不切”有助于原生态感觉的呈现——“不切”论与形、神关系的探讨——张继《枫桥夜泊》诗的阐释及相关问题	
三、作诗“不可太切”	……(275)
风致就作品的韵味而言——以风致见长的王、孟诗风在明初颇受青睐——李梦阳等扬“沉着痛快”的格调而抑“优游不迫”的风致——王、孟诗风再度浮出水面——胡应麟在格调的旗帜下标举神韵——陆时雍的“神韵”说不再附属于格调论	
四、风致与神韵	……(286)
结束语	……(310)
主要引用书目和参考书目	……(313)

## 绪 论



### 绪 论

“明代诗学”，这无疑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课题。照雷纳·韦勒克的说法，一切文学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对古代诗学的研究不应当成为一项单纯的古籍清理的课题，而应当有助于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这种学理意义上的“古为今用”的使命是难以圆满完成的。但由于这一使命并非为“明代诗学”所独有，其压力也就减轻了许多。

“明代诗学”的特殊的挑战性在于：明人的理论建树与创作成就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往往出现不平衡关系，这一点不难解释，因为艺术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与创作的不平衡却会令许多人陷于困惑。并且，早就有学者反对将文学批评或诗学研究作为自给自足的学问来看待，而要求将它与文学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面对这种难于攻克的问题，我们将依据下述的假设展开讨论，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间接的；直线的因果说明没有多少合理性。

我们的假设其实也是有所依傍的，并不是“自我作古”。关于明代诗学，朱东润先生在《何景明批评论述评》中已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文学与文学批评，截然两事，其成就之先后，各有

历史。在文学批评，当然不能脱离文学而独立，然两者之盛衰，初无连带之关系。中国批评时期，在梁代极盛，其时文学上之兴趣虽浓，而文学上之成绩，较之前代，未见超绝。初唐、盛唐在唐代文学史上放一特采，而文学批评之成熟，反迟至中晚以后。两宋批评意趣更觉浓厚，除文学批评外，更及其他艺术，如书法、画法等，在宋人题跋中，皆章章可考。而大胆的批评精神，直至明代始见卓越，在号称复古之四子中为尤甚。常人持论，对明代每加菲薄，倘就文学批评之观点论之，不能不为之惊异也。”朱先生认为明代诗学在中国诗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晚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五说：“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诗赋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晓，识见议论代日益精，则人未易知也。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翕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许学夷的具体结论未必妥当，但指出创作与理论在成就的高低上并不一致，却是至理名言。

确实，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是复杂的、多重的。文学史上经常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鸿沟。比如唐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围绕着《风》、《雅》、比、兴的传统发表了许多看法，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结、白居易，基本的意见大体统一，而实际的文学创作却独立展开，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甚至有像欧阳修那样的作家，他的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存在明显的脱节之处。当然，也存在另外一些对自我意识把握非常准确的作家，比如黄庭坚，他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紧密配合。这种复杂多重的情形，提醒我们，文学批评可以是一项相对独立、自给自足的课题。它与创作实践的联系自然是割不断的，但是我们不必

夸大它对实际文学现状的影响，尤其不必将理论的成就依附在创作的成就上。人们可以毫不牵强地证明理论对实践的作用和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但理论价值的评估与创作成就的衡量毕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对明代诗学的关注不妨在这样的范围内提出问题：明代的种种诗论意味着什么？是否言之成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展开、演变？明代诗学的体系建构是否新颖、严密？展示了怎样的理论景观或理论前景？等等。原因和结果往往不在一条直线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作了以上的说明后，绪论拟阐释与明代诗学相关的几个外围问题。如明代诗学的古典主义思潮、明代诗学的古典诗歌创作背景、明代诗人的大家情结等，以便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绪 论

## 一、汉族文化的复兴与明代 诗学的古典主义思潮

就主流而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它的一系列前后贯串的流派，如闽中诗派、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广五子、几社，绵延相续，与整个明代相始终。而众多的另立旗号的反对派，如吴中四才子、公安派、竟陵派，也是以古典主义思潮为其存在前提的。毫不夸张地说，要把握明代诗学，首先必须对其古典主义思潮的勃兴加以透视。

古典主义精神在明代的发扬是汉族传统文化复苏和兴盛的产物。元初，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传统文化极端蔑视，他们继马上得天下之后，执行了一套马上治天下的政策，废科举，抑儒生，读书人沦落到“老九”的地位。元仁宗皇庆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汉族传统文化虽有所抬头，但未能形成大的气候。只有到了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帝国之后，汉族传统文化才以浩大的